
書 評

評介安娜汀《耶穌會士與母權：
近代早期中國的家庭崇拜》*

潘鳳娟**

書 名：*Jesuits and Matriarchs: Domestic Wo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作 者：Nadine Amsler

出版時地：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8

頁 數：258 頁

* 收稿日期：2021 年 2 月 1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耶穌會士與母權：近代早期中國的家庭崇拜》一書的作者安娜汀(Nadine Amsler)博士，1983 年出生於瑞士，2015 年於伯恩與符萊堡大學大宗教、歷史與中文學系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房內的天主：中國的耶穌會士，婦女與家庭基督教〉(*The Lord of Heaven in the Inner Chambers: Jesuits, Women, and Domestic Christianity in China, 1580-1690*)。目前於柏林大學近代史系擔任研究員。本書是根據其博士論文改寫後出版的專書，採取典型敘事性的歷史書寫方式，建立在龐大的檔案資料與早期耶穌會文獻的基礎之上，以非常流暢的文字，娓娓道來長期被忽略、來自 17 世紀中國閨門裏的天主教故事。此書已經獲得多位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領域重量級學者的肯定，如比利時魯汶大學鐘鳴旦教授(Nicolas Standaert)、賓州州立大學夏伯嘉教授、牛津大學沈艾娣教授(Henrietta Harrison)與波士頓大學梅歐金教授(Eugenio Menegon)。

近代早期耶穌會在全球的傳教工作，在遭遇強大文明如印度、中國的挑戰時，即使受到禁教、驅逐的威脅，仍致力於調適地方文化，建立長久的傳教據點，也深入地方社群內部組織和思想的內層，使其傳教的影響力得以世代相傳。過去研究中國天主教的學者，多半面臨資料短絀的窘境，不僅相關紀錄難尋，甚至中西文獻對於教友的稱謂也不一致，即使掌握資料也很難取得充足資訊確認人物身份，研究難度很高。學者對中國教友的研究常以「被忽略的聲音」來形容這群長期被邊緣化的人物，他們之於中國天主教會的貢獻，往往不被提及或記錄。研究早期中國天主教友的困境如此，女性教友的面貌更顯模糊。這些教友的聲音之所以被忽略，不

完全是學界主動造成，客觀條件的限制影響更大。

因此，本書作者安娜汀竭盡所能地翻查、解讀檔案，本已非常值得肯定。她所根據的檔案主要是位於梵諦岡、義大利和葡萄牙 3 個國家總計 10 個檔案館的原始文獻。分別是教廷所屬的耶穌會羅馬檔案館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教廷信理部檔案館 (Archivio della Congregazione per la Dottrina della Fede)、教廷傳信部檔案館 (Archivio Storico della S. 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教廷秘書處檔案館 (Archivio Secreto del Vaticano) 以及宗座圖書館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義大利的卡撒納騰瑟圖書館 (Biblioteca Casanatense) 和羅馬國家中央圖書館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di Roma)。還有葡萄牙國家圖書館 (Biblioteca Nacional de Portugal)、阿猶達圖書館 (Biblioteca da Ajuda) 以及國家檔案館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 等 (頁 218-219)。她挑戰並克服了研究中中國女性教友在資料上的難題，填補研究上的空白，貢獻良多。

爲了讓讀者容易區別作者原意和書評者意見，以及方便讀者在閱讀此文時，掌握原作的論述重點，以下採取摘述全書組織架構與內容方式呈現。

在導論中，安娜汀花了相當篇幅來交代明清社會的性別關係，特別著重在男女有別的禮教與觀念，此乃中國女性身處不同於歐洲的社會脈絡。面對強大的父權社會，她們的處境如何延伸並影響了中國天主教會的建立。作者同時說明中國女性在傳統地方宗教中的角色、貢獻以及參與方式，並以此對照女性教友如何在天主教會中延續與調適這種模式。本書作者也討論特利騰大公會議 (Council of Trent, 1543-63) 之

後，歐洲天主教在全球傳教時（包括耶穌會、道明會與外方傳教會），對地方文化的所採取的調適態度，尤其是涉及教義解釋的鬆綁（頁 8-9），提高女性參與天主教傳教事業的機會。

作者的研究側重江南一帶，包括南京、上海、松江、嘉定等城市的天主教家族，雖然涉及這些地區的相關史料、文獻、檔案，例如年信、中國研究的出版品等，大抵跟過去相關研究的歷史學者，沒有太大差別。但安娜汀卻以新的視野，對於同一批文獻提出不同的閱讀與詮釋。

作者在第一章〈人要衣冠、佛要金裝：耶穌會採取文人的男性角色〉(Clothes Make the Man: The Jesuits' Adoption of Literati Masculinity)，從中國耶穌會士的衣冠選擇，展開討論，說明他們如何選擇、適應傳統中國以男性為中心的文人角色。服飾是社會階級的象徵，耶穌會士穿戴文人衣冠，以向中國人展示，自己雖來自西方，卻具備相當於士紳的身分。此舉在其他修會眼中是違反了安貧的大願，不過，耶穌會士認為服裝與宗教無關，教士可以依地區差異調適穿著。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刻意選擇了深色樸素的衣著，這樣的選擇也緣於財力不足，難以負擔文人的物質生活標準（頁 16）。中國耶穌會士既然選擇了文人的路線，相應的價值衝突隨之而來。例如，文人的厭女言論、男色問題，以及違反中國孝道的獨身主義，對於耶穌會士來說，都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第二章〈女德的王國：耶穌會對於中國道德地景的描述〉(A Kingdom of Virtuous Women: Jesuit Descriptions of China's Moral Topography)，作者關注耶穌會士文獻中，傳統社會裏關於男女有別的實踐狀況，同時延伸到維護女性貞節

相關措施的描述。如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曾提到「閨門如聖地不可侵犯」(頁 42)，女性的活動範圍高度受限，以及貞節牌坊所展示的極端案例(頁 44)。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宣稱，他在中國期間從未見過中國女性，因為她們被禁足與世隔絕，唯有前往寺廟參拜時，外人才有機會見其身影(頁 45-46)。

本書作者安娜汀在第三章〈創造性張力的來源：文人耶穌會士與神父的職責〉(A Source of Creative Tension: Literati Jesuits and Priestly Duties)指出晚明耶穌會士的雙重身份及延伸而來的創造性張力(頁 47-48)，使他們在與中國文人交往的過程中，提供了正面的助益。作者使用「文人耶穌會士」(Literati Jesuits)，或是「先生」(literatus)來指稱這批穿著文人衣冠的耶穌會士(頁 48)。安娜汀根據許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的研究，將文人耶穌會士以中文的「先生」二字解釋(頁 179)，主要對照耶穌會士的雙重身分：「司鐸／鐸德」和「先生」，強調他們同時具備文人與神職身分。就筆者所知，在李九標等人紀錄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的《口鐸日鈔》一書中(卷一)，同時有「司鐸」、「先生」兩種稱呼。此外，如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被稱為西泰利先生(如艾儒略所著《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艾儒略被稱為艾思及先生(如李嗣玄所著《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迹》)，也是例證。其實自利瑪竇於《天主實義》一書中，採取「中士」與「西士」對話體例書寫以來，耶穌會士的士人形象已經不侷限在外表的衣冠服飾，而是深入思想與文體。

另外，與佛教的宗教活動讓婦女前往寺廟，甚至可直接

進入閨閣內直接接觸的舉措不同，從第一代耶穌會士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 1559-1654) 開始，天主教即是於家戶內，在男性親屬在場的情況下，與中國女性以隔著簾幕的間接方式，施行宗教聖事，甚至迴避了儀式過程中肢體接觸的程序。總體來說，耶穌會士對於中國婦女的福傳工作，主要藉由男性親友、孩童、僕婢和太監等人的協助，以間接的方式進行(頁 50)。因為相關宗教活動都在女子家中進行，逐漸地，家庭成爲女性福傳的空間，家庭的小聖堂(*house oratory*)便慢慢建立起來(頁 55-56)。當然，爲適應中國男女之防，在施行聖事時省略部分程序的作法，也招致在華其他修會的批評，認爲此舉不合教法而使聖事無效。儘管因爲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的努力，使教廷傾向支持耶穌會士的權宜策略，但仍爲日後禮儀之爭埋下火種。耶穌會士向女性福傳之舉，不僅危害禮教，更加深反教士人對天主教的疑慮(頁 58-64)。

第四章〈婚姻紐帶的強化：中國婚姻的基督教化〉(*Strengthening the Marital Bond: The Christianization of Chinese Marriage*)，這一章的關鍵在於中國教友納妾的問題。耶穌會士並未反對儒家的婚姻觀、婚俗等，唯獨堅決反對納妾和出妻這兩項(頁 69)。他們主張，一夫一妻是天主所設立的制度，且更合儒家孝道(頁 83)。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c. 1566-1640)認爲中國五倫當中，最重要的是夫妻關係。此外，女教友與非教友締結婚姻，是否可以在教堂前舉行祈禱等儀式，需要男方的同意(頁 72)，其中多數選擇另外舉行天主教儀式來彌補。在中國禮儀之爭中，對於跨宗教的婚姻是否具有效力，也成爲爭論的議題。其他

修會的傳教士認為，未舉行婚姻聖事的婚姻是不合法的（頁 76），耶穌會士雖認可其合法性，但若是妾則可以離婚。他們建議的處理方式有幾種，將妾改嫁、分居，或是送回娘家。無論哪一種，其實都有損文人名聲，也不利於妾的未來生活（頁 85）。

第五章〈延續香火的祈求：婦女與天主教的靈性救濟〉(Praying for Progeny: Women and Catholic Spiritual Remedies)，除了納妾，殺女嬰也是讓耶穌會士困擾的問題。中國傳統有關婦女生產的各種禁忌，與生產高風險有相當關係。在這件事上，天主教提供了中國夫妻一些慰藉（頁 89），聖母聖嬰像成爲求子夫妻的禱告對象。作者舉例，高一志在《聖母行實》中，記載了許多神蹟故事，講述聖母如何神奇受孕又如何保護與救助產婦（頁 93）。本書作者指出，對於這些求子婦女來說，禱告的靈驗是促使她們改信的關鍵，其宗教性，明顯地建立在靈驗的務實基礎上（頁 97-98）。

第六章〈家庭社群：婦女聚會與共同虔信〉(Domestic Communities: Women's Congregations and Communal Piety)，作者指出晚明中國佛教復興，大量佛教性質的社團、誦經會等宗教社群，是中國女性共同生活的重要方式。天主教的群體宗教活動具有類似型態，這對中國婦女而言並不陌生。在這類宗教群體或社團中，即使神父缺席，仍可由年長的女性平信徒主持家中聚會，這是女性教友維繫信仰的重要場域，比男性社群的一年一聚更爲頻繁（頁 100-112）。

第七章〈分享優雅的靈性：上海徐氏家族的女性網絡〉(Sharing Genteel Spirituality: The Female Networks of the Xu's of Shanghai)，這一章描述徐光啓(1562-1633) 幾位孫女的婚

後生活，她們在嫁入非教友家庭後，如何透過通信等互相鼓勵的方式，維持信仰（頁 102-121）。甚至，她們在喪夫之後，成為家族的長輩，反而能夠發揮影響力，甚至得使全家族改變信仰。這些女性教友，延續其先祖徐光啓作為中國天主教柱石的地位，也持續支持教會的運作（頁 1226-127）。

第八章〈寡婦及其貞節：杭州與南京的家庭修道院〉(A Widow and Her Virgins: The Domestic Convents of Hangzhou and Nanjing)，這一章討論貞女與節婦，介紹高一志《聖人行實》中，占比不高的聖女故事，主要是童身與守節（頁 129），尤其是未婚夫過世之後，守貞未嫁的女性教友，如何使全家族改信的故事。

第九章〈奉獻的織品：天主教婦女的捐助〉(Fabrics of Devotion: Catholic Women's Pious Patronage)，作者指出，中國和歐洲天主教女士為教會提供保護的情況相似，由一小群名門望族的女性教友扮演保護與捐助者角色，提供實際援助：例如供應儀式所需的綢布、祭衣、錢財等（頁 138-141），徐光啓的孫女，許太夫人，徐甘第大(1607-1680)即為最重要的捐助者。作者又指出，這些女性教友多數有自己的事業，甚至是變賣個人珠寶或是以刺繡所得，以幫助教會事工，而不必依賴夫家（頁 144-145）。

在全書的結論：〈婦女、性別與全球天主教〉(Women and Gender in Global Catholicism)，作者嘗試從當代與全球視野，省思明清天主教女性教友的宗教文化在全球傳教史的位置。她指出，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 返回歐洲時，將徐甘第大的種種事蹟介紹給歐洲教會：她生前不只想送禮物給歐洲教會，更希望能夠徵求傳教士來華。作者在此

提示了過去天主教研究被忽略的重要面向，即非歐洲地區的女性天主教友如何積極參與天主教會的建立。這種非典型的宗教型態，不僅發生在中國教會，也在日本、美洲等全球各地區。在這群女性身影的啓示下，未來歷史學者可以跳脫過去由歐洲男性獨佔的歷史言說，更深入發掘全球天主教會的多樣性，這不僅是一個跨文化的領域，更是跨性別的宗教與文化交流。她在全書結尾提出如下的評論：「由於中國婦女，天主教成爲 17 世紀中國的一個家庭宗教 (domestic religion).....中國婦女的宗教性，雖然不同於特利騰大公會議後改革者的主張，但卻更吻合近代早期亞洲天主教社群的『宗教圖像』」（頁 154-155）。

對於明清時期天主教女性的研究，在客觀條件限制下是一個很難突破的課題；相關足以作爲研究的資料太少。過去這個題目能多著墨、提出一定分量研究的成果，多半脫離不了徐光啓的孫女徐甘第大，她如何繼承乃祖之風，扮演了如同天主教三大柱石的角色，建立了天主教在中國家庭裡的基石，於明末天主教會重大貢獻。例如近期另一本新書，由楊百翰大學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亞洲研究圖書館退休館員 Gail King 所著的《所有基督徒婦女的典範：17 世紀一位天主教婦女徐甘第大》 (*A Model for all Christian Women: Candida Xu, a Chinese Christian Woma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llectana Serica, 2021)，基本上根據徐光啓、許纘曾的中文資料，以及柏應理返回歐洲時爲她出版的傳記，¹ 補

1 此書的中文翻譯已經由徐允希（徐光啓第十一代孫，神父）完成，1938 年出版，1965 年的母親節光啟出版社重排出版。柏應理著，徐允希譯，《一位中國奉教太太：許母徐太夫人甘第大傳略》（臺北：光啟出版社，1965）。中譯

充強化了主人翁的生平事蹟及其對於天主教的貢獻，然後提出一個更為完整詳盡的敘事。

安娜汀同樣花費大量篇幅描述徐甘第大的生平懿蹟，包括徐甘第大所參與和建立的女性的宗教活動、善會組織，以及這些宗教活動與佛教的差別。值得一提的是，安娜汀更從龐大的西方檔案中，蒐羅整理了所能找到的中國女性紀錄，竭盡所能地在有限材料當中，有系統地為讀者建構一個天主教女性群像，述說著罕為人知的女性故事。透過本書所提供的中國女性教友群像，說明她們在建立中國天主教會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完全不亞於男性教友。尤其是在滿足教會內部的日常運作相關需求上，甚至超越男性的貢獻。取得這些檔案已有難度，解讀工作更艱難。安娜汀這本書在這一點上的貢獻，目前尚無人超越。但讓人仍有遺憾的是，在安娜汀書中乃至其他西文文獻中，許多這樣的虔誠女性教友僅有教名與姓氏，因此難以進一步在其他中文文獻中追索更進一步的資料與史實。她們的故事需要未來繼續努力，尤其是結合中西文獻，甚至考察地方志、相關教友與曾經來往的士紳親族之家譜、文集等等資料來進行細緻的考索。在未來的研究中，期盼這些女性教友身分能夠被逐一查考出中文全名與身分，讓歷史上這一群曾經為天主教會默默付出的女性的具體面容，向身為後輩的我們展示。

此書是作者改寫博士論文而成，正式出版時將大標題

本根據法譯本翻譯：Philippe Couplet, *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la Chine : ou par occasion les usages de ces peuples, l'établissement de la religion, les manieres des missionnaires, & les exercices de piété des nouveaux Chrétiens sont expliquez* (Paris: Estienne Michallet, 1688).

「房內的天主」刪除，以「母權」取代，成為專書書名的一部分。如果本書是專講特定女性徐甘第大個人故事的話，這書名的改動才具有說服力，否則維持博士論文原來題目其實更貼近全書內容。畢竟其他閨閣裡的女性教友，並不具備如徐甘第大這樣，在丈夫過世之後，得以在家族中擁有管理全族的權力。這些女性教友作為參與者，默默地在教會中付出，雖然許多甚至連姓名都沒留下紀錄，但至少可以從她們的貢獻和成果理解與認識她們。此外，專書書名也沒有設定研究時段，讀者閱讀過程也會好奇明清之際與清末時期的中國女性教友地位和處境是否有變化。

最後，雖然安娜汀已注意到徐甘第大也如同被稱為「傳教之母」的葡萄牙女公爵 Lady Maria, Duchess D'Aveiro (1630-1715) 一樣，在耶穌會士面臨中國禮儀之爭和反對壓力時，成為各方求助的對象，並且樂於出手協助。不過尚有一些作者未使用的原始資料可以進深研究。就本人所知，日本天理大學的圖書館藏有為數不少由遠東耶穌會士寫給傳教之母的信件，並且已經由富永牧太等人編輯出版，全書收錄了 40 封信件，例如編號 15-17 為柏應理寫給傳教之母的書信、編號 30~42 為衛方濟寫給傳教之母的書信（13 封），此外尚有安多平施(Antoine Thomas, 1644-1709)（23 封）、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士閔明我(Philippus Maria Grimaldi, 1639-1712)等人。書信的年代從 1663 至 1711 年，正是中國禮儀之爭的關鍵年份，均為有關印度、暹羅、中國的內容。

² 未來作者可以延伸本書主題，藉由傳教之母的貢獻以及他與收到這些傳教士的往來，繼續探索東西方女性教友在遠東傳教事務上的貢獻。

自 1980 年代迄今，中國耶穌會士的研究維持了 40 年以上穩健成長的學術動能。從對於利瑪竇等大人物傳記的研究，傳教策略與方法，乃至本地教會的文化調適等等，已經累積了相當龐大的成果。21 世紀之後，長年被忽略的中國教友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亮，越來越多的中文文獻被重印出版，眾多天主教家族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一般。但是這一群女子的群像，卻始終被侷限在閨閣裏，外人難以窺其堂奧。本書作者蒐集整理大量的罕見的檔案、文獻資料，也透過女性視角從常見的出版品與文獻中，開出一條過去未曾注意到的女性言說路徑，儘管這些紀錄著實不多，作者由大範圍的脈絡逐漸聚焦在徐氏姊妹的貢獻，最後再以當代全球史的視野提出省思，對此領域的學術創新與貢獻極大。本書研究的時段大抵是 16 到 17 世紀，中國皇帝禁教之前不久的時期。期待未來作者可以也嘗試挖掘並比較之後的時段，例如天主教會正式重返中國以後，於東西方文化與社會脈絡均已改變的情況之下，中國女性教友在教會內的活動概況。

整體來說，這是一本提供讀者愉悅閱讀經驗的學術性書籍，如同本書主題所探討中國女性教友的信仰一樣，柔和而優雅，沉靜而堅毅。閱讀的過程，讓人眼光無法從這群閨閣女子的美麗身影中挪開，彷彿與她們一起經歷了從無到有，

² 詳見 Makita Tominaga et al. eds., *The Far Eastern Catholic Missions, 1663-1711: The Original Papers of the Duchess d'Aveiro* (極東カトリク傳道アウエロ文書), Vols. 3 (Tenri: Tenri Central Library, 1975).

建立家庭中的宗教社群，看著她們如何默默地支持著檯面上占據焦點，以男性為軸心的天主教會，敘述她們如何突破傳統中國社會對於女性限制而成為建立教會不可或缺的基石。徐甘第大及其姊妹們甚至組織善會，透過販售刺繡織品等手工，換取錢財資助在華耶穌會士的各方事業的活動。可以想見，祭台上的織品、神父的祭衣等種種宗教儀式所需的物件，也是出自她們的雙手。這一群女子在教會裡，就像母親之於家庭的地位一樣，不可撼動。我可以這麼說，本書的女性敘事證明了雖然文人耶穌會士們選擇了男性作為主要的傳教對象，但這些被忽略的中國女性教友就像「閨閣裏的天主教柱石」一樣，撐起了明清天主教會的半邊天。從這本書蒐集的檔案資料顯示，這些女性的貢獻卻極少被記錄下來。儘管如此，她們的故事，雖然隱身在閨閣裏，卻烙印在中國天主教這家庭宗教之中，代代相傳。

